

在危难中维系燕京大学校统的梅贻宝

金开泰



梅贻宝（1900—1997）天津人。知名清华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梅贻琦的胞弟。早年就读于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1915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堂，1922年毕业后因担任中国基督教青年协会会长一年，所以直到1923年才赴美留学进入欧柏林学院深造，随后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士，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28年学成归来，受聘于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历任注册课主任、教务部主任、讲师、教授、文学院院长。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7月28日占领北平。在北平危急之时部分高校，如北大、清华已纷纷迁往内地。此时燕京大学也面临着去留的抉择，校长司徒雷登说：“对我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是否跟着其他学校一起匆匆忙忙撤离到其他没有被日本人占领的地方，或是留下来静观其变”。但他一方面受高厚德“燕大所追求的最高理想是为中国人民谋福利，而不是单纯为某一政治势力或某一政府服务。”“燕大必须留在北平，为华北的年轻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的影响，也受教育部陈立夫说的“燕大一定要在华北坚持下去”的影响，即使受到不少校友的反对和批评，最终还是决定留下继续办学。此时美国处于中立，他相信，日本不会把美国怎么样。为了用美国来压制日本人，他要求在燕京大学的旗杆上，把以往升的中华民国国旗或者燕京大学的校旗，换成升起美国国旗。在管理上孔祥熙任校长、陆志伟代理校长已经不合适，司徒雷登再次出任了校长。这样司徒雷登运用其智慧，软硬兼施与日本人的周旋中，使大部分在校学生得到保护，燕京大学在北平又维持了几年。梅贻宝则因不堪忍受沦陷区的生活，并“深觉卫国御侮，需要国人协力以赴。因向学校请假赴大后方，参加抗日阵容。”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发生，8日，燕大在北平办学的严峻时刻终于到来。蓄谋已久的日军一早就侵入校园，将燕大严密封锁，俘虏了燕京校内全

部的美国籍教职员，逮捕了陆志韦（研究院院长）、赵紫宸（宗教学院院长）、陈其田（法学院院长）、周学章（文学院院长）、林嘉通（教务主任），赵承信（社会系主任）、张东荪（哲学系教授）等教师 15 人及学生 11 人。事发时司徒雷登出差天津，9 日返校，也遭到被捕，从此开始了四年的囚徒生活。1945 年 8 月 17 日才获自由。学生知道要到成都来看望大家。便在校门口放了一张约二三尺大的司徒雷登画像，并告诉看门的大爷，一看见这个人来就敲锣。9 月 28 日，一片锣声响起，全校师生立刻到教学楼前集合。在陕西街教授宿舍的前廊高台，司徒雷登用中文对师生发表简短讲话。劫后重逢，很多人热泪盈眶。在视察校园和宿舍后，在操场上又对师生发表演讲，感情至为激动。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看到我所热爱的同事和他们的学生在如此多的困难面前，仍然勇敢的坚持着，并给予我热烈的欢迎，我感到近四年的监禁是值得的。”

燕京大学被敌寇摧毁的消息，传到战时首都重庆，梅贻宝义愤填膺。他在《记成都燕京大学》中说：燕大校友群情汹涌，举行大会，出席踊跃，发言激烈。一致决议，后方复校。随于 1942 年 2 月 8 日召开临时校董会，（临时校董会以曾任董事及资深校友为成员），计有孔祥熙（庸之）、费起鹤（云臬）、艾德敷（Dwight W. Edwards）、梅倪逢吉、方东、夏晋熊、张鸿多、王敏仪等。后又议决请张群（岳军）任董事。决议下列各项：（一）燕京大学后方复校；（二）成立复校筹备处；（三）推举梅贻宝教务长为复校筹备处主任。维系燕大校统的重任就这样落到了梅贻宝的肩上，他也勇敢地担起了这付重担。

在国家危难之际，学校领导和中坚缺失，校舍、经费、设施等一无所有的情况下，燕京大学校友，临时董事会为什么有如此大的热情，毅然决定在后方复校？这可以说是校友维系一个名校校统、声誉的决心，对国家、人生未来的激情和爱校的一片赤诚。正如法学院学生殷书训所言：“到了燕京好像进了一个新的天地，它给我的不仅是一些文化知识，而是一个思想方法、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对新的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为此他在被赶出燕大后，在伪北大只上了两天课，便历尽苦辛，辗转到成都。所以梅贻宝概括说：复校宗旨，可约略举下列数端：（一）燕京大学不容日敌摧毁，校统亟应延续；（二）燕京大学师生抵达后方，需要接待安插；（三）燕京大学旨在训练人才，以实现国家抗战建

国之大业；（四）澄清燕京大学在日据下维持校务之立场，并防止敌伪在北平开办燕京大学。

梅贻宝一接任复校筹备处主任，就取得了刚从明尼苏塔大学获博士回国的韩庆濂和熊德元校友的鼎力相助，立即着手复校事宜。首先，复校筹备处的特急任务，是迎接由沦陷区前来后方的燕大师生。他们一面利用种种大众传播工具，广播燕大后方复校的消息，一面动员各地校友组织沿途接待站，尽力招待接济。师生们通过封锁线、路途的艰辛及品格都被传为佳话。如有七位同学在西安向燕大接待站借了 1850 元，到成都报到时，接待人告诉他们，西安的借款已经有人结清。原来他们的西安火车站拾到一个“铺盖卷”，送到了青年会招领。它是一个商人丢失的，里面有不少钱款。商人招领后感激之余，为他们清了账，余款又捐给了青年会。

其次是寻找复校的校舍。虽然各地校友都热烈欢迎母校落户，但权衡利弊，成都为首选，华西坝四所基督教大学联名欢迎。梅到成都考察后，华西坝已经“客满”，幸好日军轰炸严重，中小学疏散外地，于是在陕西街租用了 27 和 28 号华美女中及启化小学，四川省又将文庙拨给，安顿了师生食宿。学生在操场旁贴着一副对联：“北雁南飞，此来聊作避秦计；王师北定，他日勿忘入蜀艰。”

校舍一经决定，即筹措招生。预招新生 100 人，殊知成渝两地，报名竟逾 3000 人。于是临时漏夜加工，赶印考题，增设考场。1942 年 9 月 14 日燕大董事会在重庆举行会议。议决：（一）复校工作顺利完成，工作人员概予嘉奖。复校筹备处宣告结束。（二）推举孔庸之先生为董事长，张岳军先生为首席副董事长，费云泉先生为第二副董事长，艾德敷先生为第三副董事长。（三）推举孔庸之先生为校长，司徒雷登先生为校务长。（四）在校长及校务长未能到校供职期中，推举梅贻宝先生为代理校长及代理校务长。（五）学校组织规程仍旧。（六）燕京大学成都完成复校，呈报教育部备案，并申请补助经费。（七）为使得维持燕京大学的种种国际关系，学校英文名称可用“Yenching University in Chengtu”（成都燕京大学）字样。燕京大学订于 1942 年 10 月 1 日开课，适巧美国威尔基先生代表罗期福总统，来到成都访问，10 月 2 日向五大学师生发表讲说。大会在华西大学足球场露天举行，演讲由梅贻宝先生担任翻译。讲

台前五校列队站立听讲。燕大师生由陕西街整队，前面由校旗引导，唱起校歌出发。到达华西坝时，四友校师生，掌声四起，对燕大成都复校热烈赞许和热诚欢迎。成都复校又能以参加威氏演讲为第一课，亦是燕大历史上具有十分值得纪念的意义。梅氏声音浑厚洪亮，思维敏捷，翻译准确传神，与会师生印象深刻，深感骄傲。燕大不到一年成功复校的燕大的精神，是大家的共同努力，也是和梅贻宝的努力分不开的，因此董事会推举他代理校长也是名实至归。



维系燕大的精神，首先得维系一个学术水准高的教师队伍。由北平前后到达成都的教职员 30 余人，是大学的基本班底，但仅有这批人显然不足。梅贻宝一方面暂停了燕大过去夫妇两人不得同在一所学校任职规定，倪逢吉（家政系）、关瑞梧（社会系）、饶毓苏（经济系）等三人得以入职该校成为教员。一方面动用了各种力量和渠道，聘请了若干大师，其中有陈寅恪（历史）、萧公权（政治）、李方桂（语言）、吴宓（文学）、徐中舒（上古史）、赵人隽（经济）、曾远荣（数学）诸教授。陈、李、萧后都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外籍教授有包贵思、赖普吾、范路德、罗宾孙、郝思奇等等。1944 年日军遣散了部分关在山东潍县的教师，梅亦努力动员归校。梅氏在美国纽约旅舍与夏仁德（Randolph Sailer）（心理系）恳谈一夜，使他洞悉了燕大成都的情况，1945 年春到达成都。梅氏对这些人不嫌成都燕大的简陋而来，后来在回忆中说：“至今犹觉心感不胜”。又说“这些位大师肯在燕大讲学，不但燕大学生受益，学校生辉，即是成都文风，亦且为之一振。在抗战艰苦的岁月中，弦诵不但不辍，而且高彻凌霄，言之令人兴奋。”陈寅恪因眼疾住存仁医院，学生自动组织看护，轮班侍候，陈公感念之余，在梅贻宝探望之时表示“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犹存。”梅对此一直念念不忘，四十年后仍说：“至今认为能请陈公来成都燕京大学讲学，是一杰作。而得陈公这样一句评鉴，更是从事大学教育五十年的最高奖饰。”又将任职于《大公报》的燕大校友蒋荫恩请来担任新闻系主任，使新闻系成为燕大在抗战中最负盛名的系。梅贻宝根据师资的情况，梅氏在“复

校感言”中称文理法三院先设九系，文学院设国文、英文、历史、新闻四系；理学院设数学、家政两系；法学院设政治、经济、社会三系，配备了相应的主管人员。为了表示对大师的崇敬，他打破了燕大教授素来月薪只有三百六十元，校长也不例外的规矩，将特约教授的底薪定为四百五十元。

复校后维系学校的运转校长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筹措经费。梅贻宝回忆当时筹措经费时说道：“早在南开中学听张伯苓校长说过：‘我为自己向人求告是无耻；我为南开不肯向人求告是无勇。’余在此训示下，鼓起勇气，发动求告。能拜访的去拜访，不能拜访的通信候教。”当时重庆《大公报》募集张季鸾纪念基金达十一万一千元。梅贻宝亲自去重庆与负责人胡政之先生进行商谈，并与《大公报》建立了合作关系，该报馆决定将纪念基金捐赠给燕大发展新闻教育事业。燕大家政系的梅贻宝夫人倪逢吉也出面帮忙，使得燕大与有关儿童福利、盲人福利、劳工等机构达成长期合作的协议。一方面学生可以在那里获得实习锻炼的机会，另一方面学校也可以获得一部分的经费补助。除此之外，梅贻宝还发起了千万基金募捐运动。募捐获得了一千二百万，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兑换四十一万美元，但是孔祥熙出于财政大局没有全部兑换，最终只兑换了三万多美元，这也是一笔不小的经费了。燕大还有一部分资金来源于英、美等国的若干教育文化机构。如哈佛燕京国学研究所，充实文史哲各人文学科，普林斯顿基金会充实社会科学各系，卫斯理女子文理学院充实燕大女部。罗氏基金补助普通经费，他们都尽量维持，而且每有增益，盛情可感。罗氏基金原规定年有所减，但经争考察后反有所增加，43至44原订3000元，增为6000元，44至45增列为15000元。这样在梅氏的努力及社会力量的和国际友邦的鼎力相助下，燕大才得以在成都坚持办学到1946年师生复员回北京。

梅氏主持校政期间，在这么短的时间，能使一所中外驰名的综合大学复校开学上课，并保持了教学高质量，工作高效率，善始善终，可谓中国教育史上的一项重要成绩，对华西地区的高教事业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梅氏自1949年侨居美国近五十年，先后任美国爱荷华大学东方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台中东海大学教授等职。曾著有《大学教育五十年》一书。

参见《燕京大学成都复校五十周年》纪念刊